

互联网时代购物便捷,多平台为阅读提供各种模式,可上海书展人气依旧爆棚——

今天我们逛书展买书,获得的是什么?



书展最后一天依然热闹,在中央大厅中心活动区举行的“相约星期二”经典诵读会吸引了众多读者驻足。本报记者叶辰亮摄

■本报记者 黄启哲

刚过去的双休日,书展迎来人流高峰,买票进场的队伍跨出了一条街。走进会场,展柜间摩肩接踵,导购员拆书的速度赶不上购买的速度,若是遇到作者畅谈创作诠释经典,场面更是热闹非凡。

互联网时代,找书看书早已不是早些年,托人代买、出版社邮购,甚至抄书传阅的窘境。如今一本新书通常数字版纸质版同步发行,数字版也比纸质版更有价格优势;哪怕是再冷门的字帖学术书,都可以在网站上寻着踪迹,一本热销经典通常能罗列出几十个版本;而Kindle等电子阅读器的普及,更是带来接近纸质书的阅读体验。

今天我们逛书展买书,获得的是什么?带着这个问题,记者在书展现场采访了数十位读者,答案呼之欲出——是亲手翻阅后,寻找真正与心灵带来共振的那些字句,所获得的踏实满足;是对碎片阅读逐步占领日常生活,仍愿意为品质阅读留下一寸光阴的美好愿望;是让阅读多一点仪式感,漫步书香之中,现场所感受到的文化与思想的激荡。

传统经典阅读升温,买书是对文化的礼遇

15岁的刘同学就在书展上完成了她阅读的“成长进阶”。去年第一次来书展,她买回了好读的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小说,很快就读完了。这一次,她选择了过去一直不感冒的经典诗词,电视综艺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点燃了她的诗词热情。不过和蔡同学不同,刘同学选择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另一本新书《康震讲诗词经典》。她告诉记者,康震是这档节目的评委,“他的解读很有意思,我能听得进去”。

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,亲近经典的原因

往往很朴素——就是觉得有趣。平日里她和同学读的最多的就是网络小说。可在她的心里,流行与经典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分水岭——一些消遣的网络文学看过就罢,可是经典图书最好是买纸质书,以后可以时不时翻一翻。

在书展,新书首发是一道靓丽风景,而传统文化和经典名著则是十多年不变甚至越发火热的“硬通货”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次带来的200册《四大名著珍藏版》全部卖出,为书创作插图的戴敦邦以八十高龄到书展签售点燃读者热情,人文社策划部主任宋强感慨:“活动时间太短了,书也带少了!”

为了与上海读者爱书、懂书相呼应,一些大社书社也把最中心的展台留给了小众好书。一套《王世襄集》被摆在三联书店展台的

最显眼位置。志愿者告诉记者,在书展第一天就有几位读者成套购买了这套一共十部的书。

而不管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书展首发的陈尚君新书《唐诗求是》,还是学林出版社主打的《唐诗笺疏》,同样也有不俗的销售成绩。几位年轻的古籍编辑很受触动,主动向读者介绍起展位的好书。他们感慨,买书,就是读者用实际行动对文化的尊重与礼遇。

与纸书面对面,感受出版业的初心和匠心

别看互联网拥有海量图书资源与便捷的物流配送,可在采访中,读者普遍认为,要买到心仪的书,还真没有逛书展这么庞大的实体展会

方便,更重要的是,走近作者和出版人,与纸书面对面的“约会”,更能感受到出版从业者的初心和匠心。

“一些图书网站总是销量优先,首页推送的都是新书畅销书,尤以教辅类、经管类、励志书为多,推销味强了、人文感弱了。”刚步入职场的赵先生来说,如果想买一本古诗鉴赏类读物,跳出来的几百上千种图书让他有大海捞针的困惑,“除非目标明确寻找某一出版社某一版的某一本书,否则实在无法从有限的网页资料中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种。”更不必说,鉴别注解、译文、排版的准确性,感受排版的阅读舒适度。

在书展上,名家名社的书总是排得整整齐齐、醒目而不失优雅。刚中考结束的蔡同学流

连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古籍社展馆附近,久久不愿离去。“买书要看出版社,大社名社的品质有保障。”在书展现场,她手中的《大学中庸译注》是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的版本,简装封面一幅古画意境悠远,选用的是王文锦译注。虽然网络购买确实便捷,但是与名家好书面对面的机会,她不愿错过,“听出版社的编辑介绍自家图书时,可以感受到,做书人那种由衷的自豪和热爱,一字一画、每个装帧设计都那么用心,特别让人感动”。

与爱书人相向而行,从中感受文化认同感

在互联网商业时代,书展最无可取代,恰恰就是每一位读者“用脚向阅读致敬”所营造的人气。这是在网络浏览或者身处任何一家书店都无法获得的文化认同感。

在书展策展人汪耀华看来,上海书展已在这座城市成为一种文化事件,“如果家人、同事、同学去了,你不去,也许会有些难堪,可能会招致有知识没文化的注释”。三三两两结伴而行,是学者聚会,有同学相约,也是父母“亲子活动”的必选。

人们常说“逛书展”,是因为读书、买书往往没有目的性,没有功利心。逛一逛,总会有一本书,与心灵深处产生共振。高考结束的李同学才逛了十分钟就有收获,他拿下一本多年前的畅销散文集。“这本书几年前有同学推荐,因为课业繁忙没时间读。今天看到又重版了,特地买一本。如果今天没来书展,就错过了。”

心仪书目太多难免有取舍。书展现场,记者遇到了已经参与超过十届书展的牟先生,依靠书展的数字系统,在“电子书架”上整整齐齐码上数十本图书。这都是他在逛书展时候,透过主题展、资深编辑推荐列出的“必读书”。精力有限,或许最终只能带走一两本,“可总不能空手回去”。

总不能空手回去,或许就是这样一句朴素的话,道出了逛书展的真谛——走进了,精神、心灵总有所获。而当越来越多的人迈出这一步,全民阅读,来日可期。

上海书展首次开辟国学馆推“七天七堂课”,七位文史专家带领读者深入了解国学

互联网时代,重读传统经典有何意义

■本报记者 董薇菁

“温故而知新”,究竟是“边温故边知新”还是“温故后才出新”?历史编纂学在西汉之前已有千年历史,司马迁如何建构自己的体例……今年上海书展首次开辟国学馆,推出了“七天七堂课”系列国学讲座。樊树志、傅杰、姚大力、陈引驰、辛德勇、张国刚、刘永翔……书展七天,每天有一位文史专家,分别围绕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国学经典做阅读导航,为观众解惑。

“七天七堂课”成为本届书展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。通过学者解读聚焦传统经典,上海书展尝试将更多文化课堂请进现场,让书展成为推介好书、引领价值阅读的书香盛会。

“守正”中看“出奇”,发现经典作者的眼光和智慧

被称为“无韵之离骚”的《史记》,究竟承载着作者司马迁怎样的治史心志?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开讲的《与司马迁对话》——问君此书有多珍令人耳目一新。

在西汉之前,历史编纂学已经有千年历史,姚大力介绍,对于当时历史书写的两种传统,司马迁并不认同。创作《史记》时,司马迁把3000年的历史进行原始察终式的追溯与完整呈现,当遇到不能完全解释的,就有所保留。《史记》的历史叙事,构成一种有意识地要突显其变迁过程、多层次包含着不同文化实体的多元历史,这正与他在《报任少卿书》中所阐明的原则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代之言”相一致,“比如,他不仅仅记录汉文明,还写到了中亚、西亚诸国。”姚大力说,这样的“治史”精神非常伟大。



有学者认为,深阅读渐成市场刚需,一批兼具文化深度和可读性的新书在本届上海书展上颇受欢迎。图为张元济撰、陈先行整理的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。

学者所拟定的选题方向,没有过高的学术门槛,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文本。而新鲜的解读角度,则展现出经典丰富的阅读层次,令不少读者萌生出再读经典的想法。

比如,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在《资治通鉴》的“守正”之中,看到“出奇”的一面,令听众耳目一新印象深刻。他举例,在历史上,曾国藩看出《资治通鉴》中兵家用法之

奇——以正治国,以奇用兵。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通过比较的方法,开讲“道家老庄的智慧”。“《老子》西文的译本要比《论语》多得多。”陈引驰的这一说法刷新了很多人的印象,“在中国,儒家和道家对于塑造中国文化都非常重要,《论语》展现的更多的是世俗、社会、道德的一面,而《老子》更注重的是思辨,其思维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应用……”

“温故而知新”,别因温故艰辛失去知新的机会

开卷有益,传统经典不仅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,而且还传递着中华智慧,为当下的决策或自省提供借鉴。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说,30年前他在求学时,训诂学、音韵学之类的研究成果,一年也出版不了多少本,但如今几乎每个月、每周都有此类新书出版。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,专业文献几乎看都看不过来。知识的流量那么大,应该如何主动学习才好?这令他萌生开讲“从《论语》看孔子的学习观”的想法。傅杰介绍,孔子所说的“学习”是从读原典开始,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君子,其中包括大量扎实的文本阅读。

这在移动互联网提供大量信息的当下尤为重要。按照孔子的观点,将知识内化需要通过反复学习,没有捷径可走。《论语》中,孔子率先强调温故而知新。有人认为,温故、知新是两个并列的词,也有一种说法称两者是表递进的关系。“在今天的语境下,或许人们更倾向向前一种理解。”傅杰说道,有人会说我们的大脑为何要成为前人的“跑马场”?也会有人迅速地拿知识变成财富、名望。“但这恰恰是一种逃避,因为温故本身是非常艰辛的过程。”

七天的国学课程中,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解析流传千古的《燕然山铭》,诗词专家、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翔教授带来题为“诗与好诗”的讲座。明史专家、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以“张居正改革漫谈”为“七堂课”压轴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“七天七堂课”每场讲座还配备手语翻译,通过网络实时直播,让书展场内场外更多人走进国学,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上海书展海外作家出版人的声音

社交媒体的发展仍然给旅行文学留有极大空间

要回答“日益发展的现代媒体是否会阻碍旅行文学的发展”,我认为虽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,然而大众和作家的旅行经验大多是不同的,大众媒体具有即时性,而旅行文学则更有回忆性。

因此,社交媒体的发展仍然给旅行文学留有极大的空间和余地。在层出不穷的文化类指南和文学类指南中,庞杂的指南类信息会带给人们紧迫感,所以旅行文学仍然意义重大。

旅行文学更贴近于自传类型的写作,从读者的角度来看,阅读旅行文学的目的不尽相同,但不失也是一种对写作者的品读。

——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编辑凯瑟琳·莫里斯(上海国际文学周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和旅行文学主题讨论)

书店不应该只是为观光客而开

书店是了解普通民众生活的窗口,以书店为切口有助于读者消除对彼此文化的误解。书店不应该只是为观光客而开,融入到当地的书店才是好书店,有时过于华丽的书店反而会给自己压力。

——日本作家吉井(上海国际文学周《书店与职业精神》主题讨论)

写作对现代人而言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

当作家是一份非常严肃的事业,写作是个艰苦的过程,需要长期不断地勤奋练习,但这些经验已经成为非常珍贵并且充满意义的回忆。文学是一门优雅的艺术,通过写作这个行为我们能够更好地接近文学。文学和阅读这件事本身,就像是人与人之间在对话,这两者是有相通之处的。

写作对现代人而言是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,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的一些作品在结尾的处理上会有忧郁的色彩,主人公往往会在经历压抑和黑暗,但并不不会被这些挫折所打倒而放弃。我希望传达给读者克服挫折勇往直前的精神。

——智利作家保丽娜·洛雷斯(书香·上海之夏名家新作系列讲座)

本报记者 王筱丽整理

《方大曾:消失与重现》《方大曾:遗落与重拾》亮相上海书展

追寻报道“卢沟桥事变”第一人

■本报记者 张祯希

方大曾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,但他的事迹却让人肃然起敬——他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抵达前线报道的记者,也就是在那一年,在发回最后一篇战地报道后,他与亲友失联。失踪时年仅25岁,常以“小方”署名的方大曾以笔和相机为武器,投身爱国救亡运动,留下了约千张底片与多篇战地报道,成为中国抗战史的宝贵资料。

《方大曾:消失与重现》《方大曾:遗落与重拾》读者见面会昨天于上海书展举行。两本图书的作者冯雪松来到现场,向读者分享了这位有“中国的罗伯特·卡帕”之称的战地记者的故事。

“方大曾放弃优渥的生活,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,自觉走上战场,深入一线,留下了宝贵的新闻资料。”作者冯雪松说,1999年,他

因偶然机缘得知方大曾的故事并为之感动,此后便开始漫长的寻找之旅——从保定、石家庄、太原、大同到蠡县,一头扎进党史办、博物馆、报社查询资料,力图还原这个如彗星般闪亮而又迅速消失的生命。在他看来,方大曾的人生观与新闻观,都有极强的教育意义,不应被忘却。

《方大曾:消失与重现》与《方大曾:遗落与重拾》的问世相隔三年。今年首发的《方大曾:遗落与重拾》通过获得的新资料,对前作进行了补充。新书缘起于方大曾妹妹方澄敏遗物中的新发现,一批从未公布过的方大曾生活照与文字资料,为“寻找方大曾”提供了新线索。

在《方大曾:遗落与重拾》一书中,展示了不少新发现。比如,在北京档案馆目录数据库中一份1932年的案卷,就透露出一段方大曾不为人知的被捕经历。当时正在中法大学念书的他因为参加抗日请愿活动被捕。之后方大曾通过

一份情况说明,将这个精心策划的行为伪装成一起临时起意无辜被捕的偶然事件。方大曾心系家国又沉稳机智的性格显露无疑。又如,在方澄敏遗物中,保存有一张李大钊出狱队伍的照片。这场1933年举办的葬礼当年不少报纸都有记载,却鲜有配图,方大曾的这张现场照显得十分珍贵。

方大曾的作品中总能看到一种深入现场、展现社会现实的担当。他留在家中被妹妹保存下来的1200张底片全部都是纪实照片,大多是表现底层劳苦劳动者的,如人力车夫、纤夫、矿工、农民、遭受饥饿的孩子等。在他的文字作品中,则多用动词,鲜少有华丽的描写与抒情。

据悉,方大曾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。他曾是当年《申报》《世界知识》《良友》等上海报刊的特约记者,而他失踪时,正是以上海《大公报》战地特派员的身份奔赴前线的。

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方大曾是第一个抵达前线报道的记者。他留在家中被妹妹保存下来的1200张底片全部都是纪实照片。图为方大曾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摄影图片。